

论我国古代瓜业的历史发展

程 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瓜是重要的农作物和食物资源,因其与粮为辅,又多便于制作贮藏,不少品种还可利用隙地、棚架种植生长,在农业种植中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瓜业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代北方瓜业比较兴盛,在上古文献中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印迹。秦汉至隋唐时期,南北共同发展,甜瓜、瓠瓜、冬瓜、越瓜的种植比较兴盛,种植技术明显提高,品种信息急剧增加。五代、宋元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等相继传入并迅猛发展,黄瓜的种植、食用明显改进,我们传统瓜业的品种结构基本形成。人们充分利用闲隙土地或空间见缝插针种植生产,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甜瓜、瓠、冬瓜、越瓜、哈密瓜五种本土原有瓜种,黄瓜、西瓜、丝瓜、南瓜四种外来物种在历史上相继出现,不断丰富我国瓜业资源,构成了我国瓜业演进拓展的生动历史。

【关键词】瓜业;甜瓜;瓠;冬瓜;哈密瓜;历史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2-0018-18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Melon Industry

CHENG 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Melon is an important crop and food resource supplemented with grain that is much convenient to produce and preserve. Many varieties can also be grown in open space or with trellis, which has a unique and important position in agricultural pla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elon industry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 northern melon industry was relatively prosperous, leaving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rints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melon industry developed together. The cultivation of sweet melon, bottle gourd, wax gourd, and snake melon was relatively prosperous, planting technology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variety information increased sharply. Since the Five Dynasties,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termelon, towel gourd, pumpkins, etc.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improved rapidly. There was a great development of cucumber planting for it was widely accepted as edible food. The variety structure of our traditional melon industry has basically formed. People have made full use of idle land or space to produce plants and played a positive social role. Five native species of melon, sweet melon, bottle gourd, wax gourd, snake melon, and Hami melon, four exotic species of cucumber, watermelon, towel gourd, and pumpkin have appeared in history, continuously enriching our country's melon industry resources, which constitute a vivid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melon industry.

Keywords: melon industry; bottle gourd; wax gourd; winter melon; Hami melon; history

【收稿日期】 2019-12-03

【作者简介】 程 杰(1959—),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花卉植物文化。

瓜是重要的农作物和食物资源,自来备受人们重视。而关于古代瓜业的情况,唯见农史、园艺史、食物史等通史著作相关园艺部分有一些分阶段零散涉及^①。另有一些瓜蔬作物的集中论述^②,西瓜、南瓜、黄瓜等不同品种的专史研究^③。但对我国瓜业历史发展的整体状况缺乏全面的考察与梳理,笔者因讨论与瓜相关的文学现象,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国瓜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如何,为此在完成西瓜、黄瓜、丝瓜、南瓜等主要瓜种起源探讨之后,放眼鸟瞰,就我国瓜业的农业地位、发展进程、诸瓜品的起源发展大势等进行整体梳理阐发,以求对我国瓜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有一个相对宏观的把握或相对全面的认识。这是我国农史尤其是园艺史研究的基础或前提工作,对古代瓜业各阶段、诸瓜种各层面历史情况的具体讨论和深入把握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瓜作的农业地位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瓜是独特的农作物,品种资源较为丰富,包含果、蔬两种不同的食用价值,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对此自古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管子》立政篇讨论国家经济财富问题,列举国政“五事”,其中两项关乎民生衣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反之则是“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④所说有四类生物:桑麻、五谷、六畜、瓜瓠百果,瓜瓠与百果作为五谷粮食、六畜荤菜之外重要的食物资源,富足与否构成国之贫富的重要标准。《汉书·食货志》论国之食物经营:“种谷必杂五种(引者按:五谷),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引者按:形容收获迅捷)。还(引者按:还同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引者按:易同场,田界、疆界之意)。鸡豚狗彘,毋失其时。”观点正与《管子》相同,所谓“蓏”较之“瓜”更为宽泛,指所有蔓生植物的果实,主要即瓜类。元人王祯《农书》借以阐发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则是五种之外,蔬蓏亦不可阙者,故‘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谨’。《物理论》云:百谷者,三谷各二十种,蔬、果各二十种,共为百谷。盖蔬果之实,所以助谷之不及也。是故烹葵食瓜,乃系之《豳风》农桑之诗;畜(引者按:畜同蓄)菜取蔬,互见于《月令》收敛之后。”^⑤是将瓜与蔬、果一起作为五谷之外重要的食物资料,是与粮为辅、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类似的看法还有清人金堡所说:“蓏以菜而兼果,贵于为民用,贵于及时而用。”^⑥魏源所说:“民食以稼穡为正,瓜果为助。”^⑦都简明而切实地揭示了瓜与果、蔬相同的食用价值和在农业生产中与粮为辅的独特地位。具体而言,瓜的作物特点与价值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如程兆熊《中国园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李长年编著《中国农业史发展纲要》,天则出版社,1991年;阎万英、尹英华《中国农业发展史》,天津科技出版社,1992年;李根蟠《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俞为洁《中国食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 如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赵传集《中国蔬菜历史起源研究议(瓜菜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资料研究所,1984年印本;张平真主编《中国蔬菜名称考释》,燕山出版社,2006年。三书对葫芦、南瓜、冬瓜、丝瓜、黄瓜、甜瓜、越瓜、西瓜等八九种瓜的起源、传播、发展等逐一进行考述。舒迎澜《主要瓜类蔬菜栽培简史》(《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对冬瓜、南瓜、丝瓜的起源与种植历程,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述。

③ 如舒迎澜、黄盛璋、张箭、李昕升、刘启振等学者对西瓜、黄瓜、南瓜等都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发表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

④ 《管子》卷1,《四部丛刊》影宋本。

⑤ [元]王祯:《王祯农书》卷2,清广雅书局刻《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⑥ [清]金堡:《题阳坡种瓜图后》,《遍行堂续集》文卷8,清乾隆五年刻本。

⑦ [清]魏源:《诗古微》中编4,清道光刻本。

(一)果用瓜的鲜食价值及其相应的社会生活作用

瓜是特殊的水果,甜瓜、西瓜以及后来闻名的哈密瓜都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果用瓜。甜瓜是我国本土传统品种,以口味甘香著称,种植、食用历史极其悠久。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即有甜瓜种子出土,西汉马王堆汉墓大量的甜瓜种子更为广为人知。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说,“古人于瓜极重”^①,先秦许多文献都显示了瓜作为食物的重要地位。《论语》说“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斋如也”,《礼记·玉藻》有“瓜祭上环”(指横切瓜为多段圆环形,靠瓜蒂部分的称上环),直至晋人卢谌《祭法》(一作《祭典》)仍称“夏祠、秋祠皆用瓜”^②,可见瓜在上古、中古时期,是夏秋两季重要的祭品。《礼记·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引者按:指切成四块),巾以絺(引者按:以絺覆盖)。为国君者华之(引者按:指剖为两块),巾以绤(以绤覆盖)。为大夫累之(引者按:累即裸,不以巾覆盖),士寔之(引者按:指切去瓜蒂部分),庶人龔之(引者按:指不切去瓜蒂)。”等级分明的食瓜之礼,足见当时瓜是比较珍贵的食品,食瓜是较为隆重的宴享之事。正因此,国家设专人掌管园圃,种植瓜果,《周礼·地官司徒》“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瓜、珍异之物”所说即是,而所说瓜品主要就指用于鲜食的薄皮甜瓜。秦汉以来历代皇家囿苑都设专职管理种植供给之事。这些都充分显示其作为食物的精美与重要。

魏晋以来,我们看到士大夫文人食瓜的情趣。如刘桢《瓜赋》“甘逾蜜房,冷亚冰圭”,陆机《瓜赋》“体犹握虚,离若剖冰”,嵇含《瓜赋》所说食之“忘困解醒”。由口味之甘甜香冽,说到消渴解酒之作用。宋以来人们更多强调清凉消暑之效,如宋人黄庭坚《食瓜有感》“藓井筠笼浸苍玉,金盘碧箸荐寒冰”,明谢迁《食瓜有感》“大盍试载浮,轻刀如截肪。入手玉飞屑,荐齿冰含香。岂惟清渴吻,亦足漱枯肠”^③,清人弘昼《咏瓜》“雨润南园蔓渐长,离离结实味馨香。水晶盘内初陈处,便觉清风入座凉”^④,都生动形象地写出夏日剖瓜食用清凉解暑的快感。而西瓜,清钱维乔《食瓜和大兄》:“开怀直与冰雪清,两腋便有良飈生。……日向人间餐绛玉,会须一举作神仙。”^⑤更是大块朵颐,神清气爽,两腋生风的酣畅感觉。对于哈密瓜,清石韞玉《奉赐哈密瓜恭纪》“翠肌迎刃脆,丹液沁牙凉。真可同崖蜜,无烦问蔗浆”^⑥,也写出甘甜胜蔗的感觉。这些士大夫的作品,充分展示了我国传统几大果用瓜美好的食物品质和鲜明的食用价值。

而就一般社会而言,也有积极的消费需求。由此带来“种瓜为业”的现象,以及相应的运输流通、贩卖销售从业活动。历代文献中频频可见,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汉书》记载的秦东陵侯召平,秦亡后隐居长安东门外种瓜,应是倚倚长安都城居民的消费市场大量种植。南朝宋会稽永兴县(今浙江杭州萧山)郭原平“以种瓜为业”,以船运“往钱塘(引者按:今杭州)货卖”^⑦,应即类似情形。后世诗文中经常会看到,路边、桥头、水滨夏秋设摊卖瓜的情景,在城市则有搭棚摊卖,或肩挑叫卖,甚至有“乡人小艇载瓜往来于河港叫卖者”^⑧。此类情景早期只是甜瓜,元明以来增加了西瓜,入清后哈密瓜也加入其中。尽管品种不同,这些瓜的生产与消费情景充分显示了瓜的经济价值和生活意义,由此引发城乡从业者相应的经济活动,丰富了城乡人民的饮食生活。

(二)蔬用瓜的食用价值与生产意义

瓜的更多品种是不宜生食的,这就是蔬用。与一般茎叶蔬菜不同,瓜的果实比较结实,营养成分比

①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0,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

② [唐]徐坚:《初学记》卷28,清光绪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

③ [明]谢迁:《归田稿》卷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清]弘昼:《稽古斋全集》卷8,清乾隆十一年内府刻本。

⑤ [清]钱维乔:《竹初诗文钞》诗钞卷1,清嘉庆刻本。

⑥ [清]石韞玉:《独学庐稿》二稿卷2,清写刻《独学庐全稿》本。

⑦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9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⑧ [清]顾禄:《清嘉录》卷7,清道光刻本。

较显著,食用价值也便相对突出。清人李渔《闲情偶寄》:“瓜茄瓠芋诸物,菜之结而为实者也。实则不止当菜,兼作饭矣,增一簋菜,可省数合粮者,诸物是也。一事两用,何俭如之?贫家购此,同于余粟。”^①是说瓜类果实亦蔬亦粮。清张履祥《补农书》:“丝瓜宜近水,饭瓜宜上棚。南瓜形扁,北瓜形长,盖同类也:凶岁乡间无收,贫困或用以疗饥,是宜勿绝其种。”^②则是强调这些瓜类在荒年粮食歉收时可以直接以菜当粮,用以充饥,希望因地制宜坚持种植。所谓南瓜、北瓜是不同的南瓜品种,南瓜以其可以煮食当饭,也称饭瓜,是此类瓜作鲜明的经济价值。

瓜不仅烹煮可以当饭,还在于果实如冬瓜、南瓜之类宜于长期保存,大多数瓜实都较茎叶蔬菜更宜于盐腌、晾晒、糟酱等制作加工贮备。《诗经·小雅·信南山》“疆场有瓜,是剥是菹”,就是说以瓜作菹储备之事。汉人郑玄注释《周礼》所说“畜聚之物”特别举以“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③,即是强调瓜瓠果实的冬贮备食作用。北朝《齐民要术》就有多种藏瓜法、瓜菹法,元明以来《多能鄙事》《居家必用事类》《遵生八笺》《养小录》等日用生活用书中就收列了许多瓜菹法、酱瓜法、腌瓜法之类,这固然有追求不同风味,提高食物品质的考虑,但更主要的仍在一个“藏”字,通过不同方式将成熟的瓜实加工贮存,以延长食用时间,充分发挥其食用价值。

明了这些,再回头看贾思勰《齐民要术》,其卷次分类就颇堪寻味。卷二讲主要大田粮食作物,包括黍稷、粱秫、豆麻、稻麦等,将瓜、瓠、芋三种紧随其后,两类合为一卷,而后蔬菜、果类则别卷讨论,是瓜瓠有着准粮食的意义,自古就受到较多重视。这是我们考察古代瓜业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

(三)瓜的种植与提高土地利用率

《诗经》时代“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辟地种瓜,有屋看守。唐以前地旷人稀,凡称某人“种瓜为业”,应是售瓜为生,种植必具规模。晋左思《蜀都赋》有“瓜畴芋区”之称,是瓜与芋面积大致相当,也较为突出。宋元以来人口大增,而类似的情况便再难出现,生平可称“种瓜为业”的人物极为罕见^④。比较醒目的说法是清人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江以南业瓜者盖鲜,余所至如湖广之襄阳、长沙皆有瓜畴。”^⑤所说是西瓜的情况,种瓜为业者稀少,想必甜瓜更是如此。

对于蔬瓜来说,与甜瓜、西瓜一样也有一定的专业分工与市场化倾向,古人文献中频频出现的“贩蔬鬻菜”“菜佣负贩”^⑥,明末陈继儒《花史跋》一文讥笑“有果蔬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⑦,说的就是商贩的从业者。由于瓜菜为鲜货,这些应都是州府县城乡镇附近的市場情况,流通交易规模也应有限。就乡间农户来说,很少集中规模种植的现象。笔者只在《中国方志库》中见到一处山间种瓠为业的记载^⑧,应属制作葫芦器具为主,其他几乎未见有蔬类瓜瓠种植专以出售即中古时所说“以种瓜为业”的情景。这既与古代交通运输条件有限,瓜与粮食相比运输代价较大有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后期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入清后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粮食生产用地日益紧张,可用于其他种植经营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相应的专业种植在城郊或相邻乡村多少或有,但种植规模十分有限。

① [清]李渔:《闲情偶寄》卷12,清康熙刻本。

② [清]张履祥:《补农书》卷下,清乾隆四十七年《杨园先生全集》本。

③ 《周礼》卷1,汉郑玄注,《四部丛刊》影明翻宋岳氏本。

④ 以“瓜为业”三字在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中检索,所见人物多属唐以前,而宋以后寥若晨星。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31,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

⑥ 如清王昶《(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7:“南瓜俗名番瓜,邑种最繁,苏人大觚贩载而去。”邵晋涵纂《(乾隆)杭州府志》卷5引清人《艮山杂志》记载:杭州艮山东门外沙田市,“濒江沙田中所产瓜蔬,悉贩贸于此”。清王韬《瀛海杂志》卷1:“距吴淞西南十里地号阴冈……夜中为市。日间各处多闭户高眠,茶寮酒肆阒其无人,掉臂游行阒阒间迄无一物。一至上灯时候,百事具举,贩瓜卖菜者麇集,担头各悬一灯,为称物数钱地。”

⑦ [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37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清]仲振履修、仲振覆纂:《(咸丰)兴宁县志》卷5,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瓜菜种植最普遍的情景是家常零种闲植,以农户和士绅家庭为单位自种自给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越瓜、黄瓜瓜蔓不盛固然如此,而南瓜、丝瓜、冬瓜、瓠瓜等叶大蔓盛品种,更是如此。在土地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瓜瓠与豇豆、扁豆等豆科植物一样,成了农户家前屋后或士绅官宦之家大小庭院隙隙之地见缝插针、因地制宜种植的最佳选择。未见古人有这方面的直接论说,我们主要“以文证史”,在古人文学作品中来感受相关情景^①。陆游《蔬圃》:“山翁老学圃,自笑一何愚。饶瘠财(引者按:财同才)三亩,勤劬赖两奴。正方畦画局,微润土融酥。剪辟荆榛尽,锄犁磊块无……隙地成瓜援,余功及芋区。”是说园方三亩,均为荒杂瘦瘠之地,菜畦间杂隙地搭架种瓜。清人高士奇《悼亡》诗回忆居京城,“板屋葭墙半亩居,阶前隙地种瓜蔬。晚凉伴我亲浇灌,手挈匏壶汲水徐”^②,稍后钱载《种桑秧》诗“勤能偿废坏,隙可容瓜蔬”^③,龚本《老屋雨后》“隙地师齐民,瓜蔓延径绿”^④。戴名世《种杉说序》论种树之利,举江苏武进“有老儒吴氏,贫无隔宿之储。室前有隙地丈许,偶种瓜数本,每日以盥面之水浇之。时顺治九年,东南大旱,饿莩(殍)抱金钱珠玉以死,而老儒独以瓜熟累累,活其家七八人。”^⑤雍正《浙江通志》记载湖州归应洪妻吴氏,“年十七适洪,十八而寡,遗孤甫百日,上无舅姑,家贫甚。惟日勤女红,及屋旁隙地种瓜蔬易衣食”为生,养子成人^⑥。康熙间云南总督蔡毓荣治滇之法,其中一条即为“以无主荒山劝民种树,近郊隙地给令灌园,但使瓜壶枣栗之微,各得其养”^⑦。《(嘉庆)太仓州志》记载江苏太仓县丞殷相为官勤俭清廉,“署中隙地种瓜为饭”^⑧。上述所说或官或民,或政令或实事,都是说利用家前屋后、城郊村头闲散隙地种植瓜蔬。清道光间广东南海(今佛山南海)谭莹所说“行庵隙地田园例,结构瓜棚缚豆篱”^⑨,可谓概括总结之言,隙地种瓜是封建社会后期蔬类瓜作最基本的种植惯例和生活常态。葫芦、丝瓜、南瓜,有时还包括冬瓜,匍匐茎多离开土壤,“作架引之”^⑩,依墙、上屋、挂树、搁墙垛等方式生长,或直接在门前场地、禽畜围栏上搭架拉棚种植,总之不与五谷直接争地,充分利用各类环境条件见缝插针,向空间发展,以扩大种植数量。

也正因此,我们在元明以来的文献中,频频看到“瓜棚豆架”或“豆棚瓜架”一类固定说法。明钱继登《浣溪纱》“蝉避浓炎静未哗,东邻伊轧响辘车。豆棚瓜架野人家”^⑪,清人茹纶常《即事》“一径无人绣薜斜,豆棚瓜架翠交加”^⑫,张文虎《遣暑杂题》“杂种园蔬无隙地,豆棚瓜架还纵横”^⑬,张际亮《建昌道中》“豆架瓜棚处处同,山村不断水泉通”^⑭,陈夔龙《销夏杂咏》“树色苍茫落照痕,瓜棚豆架自成村”^⑮,这不是诗人们的风雅想象,而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文人园墅也不缺这类风光,明袁宏道《抱瓮亭记》记京城西郊友人别墅“隙地皆种蔬,瓜棚藤架,菰路葑畦,宛似村庄”^⑯。清方文《喜扑面到》“为言新徙园丁好,豆架

① 程杰:《论我国瓜的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② [清]高士奇:《高士奇集》独旦集卷1,清康熙刻本。

③ [清]钱载:《箨石斋诗集》卷6,清乾隆刻本。

④ [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28,清嘉庆刻本。

⑤ [清]戴名世:《南山集》补遗卷下,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⑥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20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清]蔡毓荣:《敬陈治滇实政疏》,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12,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⑧ [清]王昶:《(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1,清嘉庆七年刻本。

⑨ [清]谭莹:《春日感怀六首》其一,《乐志堂诗集》卷3,清咸丰九年吏隐园刻本。行庵,地名,在南海。

⑩ [元]王祯:《王祯农书》卷29,清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

⑪ [清]王昶:《明词综》卷5,清嘉庆七年王氏三泖渔庄刻本。

⑫ [清]茹纶常:《容斋诗集》卷13,清乾隆三十五年刻,乾隆、嘉庆增修本。

⑬ [清]张文虎:《舒艺室诗存》卷4,清光绪刻本。

⑭ [清]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卷8,清刻本。

⑮ [清]陈夔龙:《松寿堂诗钞》卷9,清宣统三年京师刻本。

⑯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9,明崇祯刊本。

瓜棚满敝庐”^①。陈玉璠《隋堤柳·山居》“家对椒山震水隈,豆棚瓜架足生涯”^②。这类话语的流行,充分反映这种家前屋后因地制宜零散种植,高架发蔓生长的普遍性。而这类利用隙地空间扩大种植的流行,也充分显示瓜类作物主要是丝瓜、南瓜、冬瓜等,不与粮争地,而又能“种瓜得瓜”、多尽地利的特殊作用。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瓜业发展的特殊方式,也正是其农业生产作用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所在。

二、我国古代瓜业发展的历程

我国是温带、亚热带大国,幅员辽阔,境内高原、平原、丘陵地貌丰富,是瓜类植物的适生地和优良栽培区。我国地处东亚大陆,人口众多,农耕文明极为发达,瓜的种植、食用历史极其悠久,展现出持续、丰富的历史景观。大致说来,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上古北方瓜业的突出表现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即出土葫芦种子和瓠皮^③,说明距今大约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前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积极利用。浙江吴兴钱山漾、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遗址都出土甜瓜种籽^④,表明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晚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已经食用或种植甜瓜。

商、周、春秋战国时,我国各类文献中瓜的内容较为频繁。这些文献的瓜作信息高度集中在北方地区,反映中原华夏文明核心区瓜作的相对兴盛。这时品种主要有两类:瓜与瓠。文献单称“瓜”者均指薄皮甜瓜,即后世所说甘瓜、甜瓜、香瓜。《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瓜是大瓜,瓞是小瓜,所谓瓞也可能另指一种小瓜品种。瓠,《诗经·豳风·七月》也称壶,实际包括瓠、匏两种,或有甘、苦不同,嫩时都可烹可菹,是重要的蔬用瓜。匏老枯后可作浮水用具或剖为盛具。瓜与瓠可以说是上古文献仅见的瓜作,也是此间最重要的蔬菜,常见瓜瓠并称所说即这两种。这一情景一直延续到两汉甚至更晚,《汜胜之书》《齐民要术》中“种瓜”“种瓠”仍是并列两大农事项目,可见在早期瓜作中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诗经》多篇写及瓜瓠,既有食瓜,也有食叶;既有疆场种植,也有“剥瓜为菹”;既有享食,也有祭祀。在《周礼》《礼记》等典籍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食瓜和瓜祭之礼,称“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⑤,是说国家设专人负责种植、贮藏。《论语》也有“瓜祭必斋如”的行为准则,又自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借以对不为世用的处境感慨愤懑。《左传》称齐襄王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相约“瓜时而往”,“及瓜而代”,以瓜熟为任期的标志,后世因而有瓜代、瓜期的固定词语,可见当时瓜业的社会影响。明人所说“古人于瓜极重”,正是针对这些上古典籍丰富而隆重的瓜事内容而言。

追寻这种现象的原因,当与当时文化重心高度偏倚北方有关。《诗经》所言瓜、瓠地点可考者高度集中在今河南北部的邶(汤阴)、卫(淇县),陕西渭北平原豳(彬县、旬邑)等地,而《左传》《论语》《管子》所言瓜瓠都在今山东、河南一线。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根柢均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疏松的黄土旱地极适宜瓜类作物的生长,由此带来此间典籍中相对丰富的涉瓜内容及其相应的历史文化迹象。透过这些文献内容和文化迹象,不难感受瓜在先秦时期北方农业中的突出地位及相应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中古南北瓜业的全面兴起

秦汉以来国家一统,地大物博,交通发展,人口增加,社会流通加剧,各地政治、经济联系紧密。东晋

① [清]方文:《蠡山集》续集鲁游草,清康熙二十八年王概刻本。

② [清]聂先:《百家词钞》耕烟词,清康熙绿荫堂刻本。

③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④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苏州市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

⑤ 《周礼》卷4,汉郑玄注,《四部丛刊》影明翻宋岳氏本。

南北朝虽然长期分裂,但社会交往并未隔绝,物产流通仍较频繁。隋唐重新统一,社会经济更是繁荣兴盛。在整个汉唐时期,无论南北,农业生产广泛发展,深度和广度明显拓展。在这样社会分合而农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瓜业也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倾向:

1. 瓜的农作物地位进一步明确,种植技术明显提高

《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记载西汉“尹都尉十四篇”,有《种瓜篇》与“种芥、葵、蓼、薤、葱诸篇”^①并称于时。“汜胜之十八篇”中也有种瓜、种瓠两种,《齐民要术》即引用其“区种瓜法”“种瓠法”“区种瓠法”。《齐民要术》也设《种瓜》《种瓠》两篇,与五谷、豆芋诸作物并列,可见两汉以来,瓜成为主要农作物。汉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地气上腾……急菑强土黑垆之田粪畴可种瓜,可种瓠。”二月三月均有种瓜,六七月藏瓜^②。《齐民要术》种瓜篇中有“收瓜子法”“治瓜笼法”“种瓜法”(下分“种法”“锄法”)“摘瓜法”“区种瓜法”“种越瓜、胡瓜法”“种冬瓜法”等内容,作菹藏生菜篇中有“酿瓜菹酒法”“瓜菹法”“瓜芥菹”“梅瓜法”等名目,又辑有时人《食经》多种“藏瓜法”,可见在品种、种子、田间管理、收藏、食用等方面逐步形成系统的知识和技术。秦汉时利用骊山温泉地温争取瓜作早熟^③,《唐六典》记载“近汤之地润泽所及,瓜果之属先时而育”^④,唐诗人王建《宫词》“御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所说也应是骊山温泉种瓜之事,这都是今人所说促成栽培法。

2. 瓜的品种信息急剧增加

先秦文献所说瓜实际是一类作物和食物的概念,即所谓“有核曰果,无核曰蒹”,“在木曰果,在地曰蒹”,“木实曰果,草实曰蒹”之说。其中也只有笼统的瓜、瓠之分,大瓜、小瓠之称。而秦汉以来,冬瓜、胡瓜(黄瓜)、越瓜(菜瓜)等主要栽培品种逐步见于记载。各类传说故事和辞赋诗文中,更是出现许多地方奇特品种的信息。三国魏《广雅》即罗列“龙蹠、虎掌、羊骹、兔头、桂支、蜜筩、瓢瓠、狸头、白瓠、无余、缣”^⑤等品种。晋《广志》进一步明确不少著名产地和特色品种:“瓜之所出以辽东、庐江、敦煌之种为美,有乌瓜、缣瓜、狸头瓜、蜜筩瓜、女臂瓜、羊髓瓜。瓜州大瓜,大如斛,出凉州。猗须、旧阳城御瓜,有青登瓜,大如三升瓠;有桂枝瓜,长二尺余。蜀地温食,瓜至冬熟。有春白瓜,细小,小瓣,宜藏,正月种,三月成;有秋泉瓜,秋种,十月熟,形如羊角,色黄。”^⑥陆机《瓜赋》也铺列十四种瓜品。这是秦汉以来各地品种渐为人知,不断积累的结果。从日人《辅仁本草》《倭名类聚抄》相关著录看,这些瓜名主要属于甜瓜和越瓜(菜瓜),另有少量冬瓜、胡瓜、王瓜、瓜蒌品种。与此相关的是,也出现一些瓜的名优产地。前引《广志》所说“辽东、庐江、敦煌”就是汉魏时瓜的三大著名产地。据《齐民要术》所辑资料,成都、广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也都有名瓜出产。

3. 种瓜为业者渐多

种瓜为业者频频见于记载,最著名者莫过于秦亡后,秦东陵侯召平隐居长安东门外,以种瓜为业,瓜甚美,世称东陵瓜、召平瓜,借用今天的概念,应是地标或品牌产品。《三国志·步骘传》记载,步骘“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也是说以种瓜为生计,可见类似的情景南北俱见。

(三)近世瓜业的深入发展

①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38,民国十九年影清光绪二十年黄冈王氏刻本。

②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47。

③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7引郭训《古文奇字》:“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

④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19,明刻本。

⑤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10上,清嘉庆元年刻本。

⑥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978,《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宋元以来,社会转入“近世”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明显变化,社会日益繁庶,相关文献信息和记载也具体明确,瓜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种植、销售和食用情况趋于丰富而明朗,与现代社会相应的生活情景也更多联系和接近,而整体上也显示出广泛传播、积极种植的景象。其中重要的有两点值得一提:

其一,五代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相继传入,丰富了相应作物和食用品种^①。品种类型趋于稳定,冬瓜、南瓜、丝瓜为主的蔬用,甜瓜、西瓜为主的果用格局逐步形成,奠定我国传统瓜业的品种结构。元人《农桑辑要》列瓜(甜瓜)、黄瓜、西瓜、冬瓜、瓠五种。王祯《农书》明确开始瓜的分类,分果瓜、菜瓜两大类,列举甜瓜、越瓜、黄瓜、西瓜、冬瓜、瓠等。这时北方地区丝瓜的种植应未普及,所以缺载。入明后,王世懋《学圃杂疏》、周文华《汝南圃史》、明末《致富奇书》《农政全书》增加了丝瓜。清鄂尔泰《授时通考》则分蔬、果两类,蔬属有菜瓜、黄瓜、南瓜、冬瓜、丝瓜、葫芦,果属有甜瓜、西瓜,这无论大类还是具体品类名称,都比较严密齐备。清康熙以来,作为硬皮甜瓜的哈密瓜开始进入内地,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也正是康熙以来,西葫芦、笋瓜陆续在我国北方出现。仅就名称而言,西瓠、西葫芦最初见于山西、甘肃等地,有可能从西域传入^②,主要在今所说“三北”地区传播。笋瓜的名称比较明确,首见于河北大名^③,在河南、山东、湖北、四川等地多有传播,这都进一步丰富了蔬类瓜的品种。

其二,各类瓜的传播越来越广泛,种植越来越普遍。唐以前以种植果用甜瓜为主,种植比较普遍。宋以来,陆续传入的丝瓜、西瓜、南瓜等的种植都逐步普及开来。黄瓜摆脱了佛经负面评价的消极影响,由早期的黄老作菹转变为食用青嫩为主^④,促进了种植、食用的迅速发展。苏颂《本草图经》说冬瓜“今处处园圃蒔之”,范成大《西瓜园》诗题下注称西瓜“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诗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宋人《草木记》:“丝瓜一名天罗絮,所在有之。”^⑤明李时珍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胡瓜(引者按:黄瓜)处处有之”,“丝瓜唐宋以前无闻,今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这些都可见,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深入发展,瓜之作为水果和蔬菜,全国各地种植利用极为普遍,尤其充分利用闲隙土地或空间见缝插针种植,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

另外,种植技术明显提高,这在农史、园艺专门史著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种植专业化、市场化也有一定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士大夫阶层,以《多能鄙事》《居家必用事类》《遵生八笺》《养小录》等为代表,推出一系列以瓜为原料的精致菜肴,在烹调、腌菹制作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发明和创造,进一步拓展了瓜的食用价值,为后来人们的生活应用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① 请参见笔者《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我国南瓜种植发源、兴起于京冀》。

② 清方叔裔修《(康熙)朔州志》卷2:“葫芦、匏子、西瓠。”康熙十二年编、民国二十五年石印本。沈继贤修、常大升纂《(雍正)重修岚县志》卷15:“南瓜、西葫芦(俗名葛瓜)。”清雍正八年刻本。刘士铭修、王霭纂《(雍正)朔平府志》卷7:“葫芦:二种。青而长,有棱者曰西葫芦;白而尖圆者曰白葫芦,即匏也。”清雍正十三年刻本。黄文炜、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物产》:“葫芦:二种。皮坚硬而色黑者,俗呼西葫芦;皮柔软而色青白者,名甜葫芦,气味甘平,无毒。”清乾隆二年刻本。这里出现的所谓西瓠、西葫芦究属瓠或葫芦之一种,还是今人所说西葫芦一时还无法确认。但就名称而言,又确实实在北方以山西为中心的三北地区逐步出现,后来沿用。不仅甘肃已有,道光间新疆《哈密志》物产志也有记载,晚清、民国间的分布又以“三北”地区为主,这是我们赞成西葫芦应由西域陆路传来的依据。相关论述还可参考李昕升、吴昊、刘宜生《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7年第5期)。

③ [清]张维祺、李棠纂修:《(乾隆)大名县志》卷20,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④ 程杰:《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⑤ [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25,程杰、王三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

三、我国主要的瓜类作物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类型多样,境内绝大部分地区都适宜瓜类作物的生长,瓜的栽培历史极其悠久,种质资源十分丰富,形成独特的栽培品种体系,出现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品种类型。元王祯《农书》论瓜,“为种不一,而其用有二,供果为果瓜,供菜为菜瓜”^①,就其所说,甜瓜、西瓜是果用瓜,哈密瓜是甜瓜中的厚皮种类,也属果用。冬瓜、南瓜、丝瓜、越瓜、瓠瓜则是蔬用瓜,它们共同构成我国传统瓜业的主要品种。为了充分展现我国瓜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按出现和传播兴起的时间先后顺序,就这些品种的栽培起源、传播发展逐一进行梳理考述。值得注意的是,排在前面的五种,即瓜(甜瓜)、瓠(葫芦)、冬瓜、越瓜、哈密瓜(厚皮甜瓜),是我国文献记载原有的,我国应为次生乃至原生中心,后面的四种即黄瓜、西瓜、丝瓜、南瓜,是明确外来传入的。正是这数千年逶迤而来,一一登场的生动景象,与上文所论点线、点面结合,能充分展示我国瓜业历史发展的有机进程。

(一)本土原产

1. 甜瓜

甜瓜是种质资源最为丰富复杂的种类,今园艺品种有厚皮、薄皮之分。《礼记》说为天子削瓜,《北史》记载王黑为人俭嗇,见客“削瓜皮侵肉稍厚,黑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②。曹丕所说“沉李浮瓜”,薄皮甜瓜肉质松脆,成熟时中有空腔,而能浮于水。《墨子》所谓“甘瓜苦蒂”。这些细节充分表明,我国上古、中古时期,人们一般泛称瓜均为薄皮甜瓜,后世泛称果用之瓜未指明品种者也都为这类薄皮甜瓜。

甜瓜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品种,《诗经》所说“七月食瓜”即是。相传尧舜时许由《箕山歌》有“甘瓜施兮叶绵蛮”^③,春秋《墨子》有“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④,汉魏古诗有“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⑤之语,时代未必完全可靠,但说明至迟到汉朝“甘瓜”之名开始出现。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西晋嵇含《瓜赋》将灵芝、芙蕖、甘瓜并称云芝、水芝、土芝,《齐民要术》所引《神异经》(传为汉东方朔所撰、晋张华注,后世多表怀疑)称椰子“华如甘瓜”,前者泛泛形容,后两者均明确指称,表明最迟晋宋时“甘瓜”这一名称已基本确立。至迟唐代,甜瓜的名称在孙思邈《千金要方》等本草医书中已频繁出现^⑥,所指即甘瓜,宋以来逐步取代甘瓜成为通名。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甜瓜之味甜于诸瓜,故独得甘甜之称”,是这一名称流行的原因。香瓜最初多作为甜瓜之一种,而后也渐有通名之势^⑦,所谓甘瓜、甜瓜、香瓜多数情况下都是异名同实。

我国有可能是薄皮甜瓜的一个原生中心,至少是次生中心^⑧,栽培和食用的历史极为悠久。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以出土蚕丝著称,同时也出土甜瓜种子,说明距今4400~4200年的先民们已经种植食用甜瓜。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甜瓜种子,尤其是出土女尸食道、肠胃中发现大量甜瓜子,湖北云梦、

① [元]王祯:《王祯农书》卷29,清广雅书局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② [唐]李延寿:《北史》卷62,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③ [明]冯惟讷:《古诗纪》卷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唐]马总:《意林》卷1,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⑤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966,《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⑥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卷17、卷21,佚名《司牧安骥集》卷7、卷8。更早的[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6、卷7方中也用“甜瓜子”,明正统《道藏》本。

⑦ 如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7将香瓜与金瓜、银瓜并列著录,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在甜瓜下列金瓜、银瓜、香瓜、华瓜,香瓜又是色青形小者一种。前者即略有通名之义。

⑧ 齐三魁、吴大康、林德配主编:《中国甜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第6页。

江陵、江苏邗江、广西贵县等西汉墓都出土甜瓜子^①。西汉后期的《汜胜之书》有“区种瓜法”，根据《齐民要术》的解说即属甜瓜内容。这些都表明至迟到汉代甜瓜的种植已有很大的发展，此后一直为我国各地最常见的栽培品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甜瓜品种极为丰富，清人吴其濬论述道：“甜瓜类最繁，有圆有长，有尖有匾。大或径尺，小或一捻。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或黄斑疹斑，或白路黄路。其瓢或白或红，其子或黄或赤或白或黑。要之味不出乎甘、香而已。”^②先秦时《诗经》中有瓜、瓠之分，大瓜为瓜，小瓜为瓠，所说应主要是大小两种不同品种。汉魏以来，《广雅》《广志》、文人《瓜赋》及一些杂史杂记中出现不少各地奇瓜异名。而以瓜色青绿者最为正宗，晋人《广志》所列有乌瓜、春白瓜，应是指不同颜色，另狸头、女臂之类应主要说形状。但这些品种，唐以前都未见有进一步的记载，唐以后也多无明确的后续信息。

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一些新的品种信息，后世逐步落实为甜瓜的主要品类。如晚唐释贯休《秋居寄王相公》“山童春菽粉，园叟送银瓜”，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徐氏《宫词百首》“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游歇翠华。帘畔玉盆盛净水，内人手里剖银瓜”，所说银瓜是指瓜中的白皮品种，后来成了固定的品种名称。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瓜青、白、黄等色，有名金皮、沙皮、密瓮、算笏、银瓜。”^③同时地方志中也有反映，浙江绍兴《（嘉泰）会稽志》：“越有银瓜、握青瓜、算笏瓜。握青谓其小，可藏握中；银以色名；笏以状名。”^④台州《（嘉定）赤城志》：“瓜有金瓜、银瓜等种，又有名八棱、约青、算笏者。”^⑤两地相近，有同有异，所谓握青、约青指大小仅一握^⑥，应即《诗经》所谓瓠之类。元人《（至顺）镇江志》：“甜瓜，种有大小，小而黄者曰金瓜，白者曰银瓜，碧者曰香瓜，又名一握青，其大而青，质斑纹者曰华瓜。”^⑦所说未必完全确切，但依瓜色分，青者称香瓜、甜瓜或青瓜，黄者称金瓜，白者称银瓜或白瓜，青而有斑纹者称花瓜，成了后来甜瓜品种的几大类型，除一些地方独有品种外，各地方志所载都大同小异，构成我国薄皮甜瓜品种的基本类型。

甜瓜分布极为广泛，我国但凡有瓜的地方都少不了甜瓜，即在哈密瓜盛行的新疆，仍有方志记载哈密瓜的同时记载普通甜瓜^⑧。甜瓜适应性强，种植简单，生长期短，北朝《齐民要术》称“瓜收亩万钱”，元王祯《农书》称甜瓜“一枚可以济人之饥渴，五亩可以足家之衣食”^⑨，可见经济效益比较突出。因而在我国各地，无论小户零散自种自给，还是大规模种植为业都极为方便而普遍。而品味既甜且香，瓜肉或脆或酥，食用价值较为显著，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2. 瓠（葫芦）

瓠，上古、中古时期人们多与“瓜”相提并称，为瓠类植物的总称，至少包括一种名瓠的植物。《说文解字》解释瓠、匏二字互训，《诗经》的早期训解也多将两字视为同义。但就《诗经》相关的内容，无论就字形还是语意看，都是明显两种不同植物。《小雅·南有嘉鱼》“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小雅·瓠叶》“幡幡瓠叶，采之亨（烹）之”，果实与叶味甘，可用作蔬菜，这是一种。《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壶，通常多

① 陈文华：《漫谈出土文物中的古代农作物》，《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31，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

③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8，清《学津讨原》本。

④ [宋]沈作宾修、施宿纂：《（嘉泰）会稽志》卷17，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⑤ [宋]黄昈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36，《台州丛书》本。

⑥ 笔者老家在苏北泰兴县，儿时有一种小瓜称狗卵子瓜，结实累累，鸡蛋大小，皮、肉、瓢色均同一般青皮瓜，应即这里所说握青同类小瓜。

⑦ [元]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4，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

⑧ [清]和宁撰《（嘉庆）三州辑略》卷9：“瓜，有黄、绿、白瓢三色，西域回人最佳品。”清嘉庆十年修旧钞本。这是说的哈密瓜，另专列“甜瓜”一目。

⑨ [元]王祯：《王祯农书》卷29。

视为蔬用,也即此种。《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所说是可以渡水系身作浮标的葫芦,《大雅·公刘》“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是以匏酌饮,都是制作器具使用,这又是一种。两种多以瓠、匏分别称之,后世所谓“甘瓠苦匏”即是。从文字使用上说,瓠既是类名,可以概指包括匏在内的同类植物,又是其中可以蔬用的独立一种,后世多称瓠瓜、瓠子。匏则是瓠中一种,魏晋以来多称作葫芦^①,嫩时也能食,只是稍苦些。

瓠类作物的利用历史极其悠久。瓠或葫芦子,在我国新石器以来的出土文物中屡屡有见。大约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新石器遗址即发现有壶芦皮^②,距今7000~5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小葫芦种子和瓠皮,另如杭州北郊半山水田畝新石器遗址曾报道的西瓜籽,被重新鉴定为葫芦或瓠瓜籽^③。《诗经》多篇言瓠匏,《论语》《庄子》都有以瓠匏譬喻说理的著名说法,《齐民要术》将“种瓜”“种瓠”与黍稷、粱秫、大豆、大小麦、水稻等相提并论,都充分反映瓠类作物在我国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宋以来地方志渐起,瓠与匏、瓠子与葫芦是各地方志物产蔬果中最常见的品种。我们举几例作为代表,如福建,明《(弘治)八闽通志》:“瓠,似越瓜,长者尺余,夏熟味甘。又一种名瓠瓢,夏末始实,秋中方熟,经霜可取为器,俗呼葫芦。”^④河北,明《(嘉靖)清苑县志》:“瓠,味甘,间有苦者。又一种名匏,所谓瓜匏之瓠,即今葫芦。”^⑤四川,清《(乾隆)射洪县志》:“瓠,瓠之甘者长而瘦,名曰瓠。匏,短颈大腹曰匏。”^⑥甘肃,《(道光)镇原县志》:“瓠子……瓠一名瓠瓜,皆甘滑可食,邑人晒干用者名瓠条。”“壶卢……有二种,有柄而圆者名甜壶卢,可为茹,经霜作瓢。腰细者名苦壶卢,又名药壶卢,入药用。”^⑦上述内容分属东南、华北、西南、西北四大不同地区,明清几个不同时代,所载有详有略,但都明确有瓠、匏两种,而匏者(葫芦)可蔬食,也可作器,典型反映了我国各地分布和使用的情况。由于瓠、匏嫩时均可作蔬,可烹可齏,尤其是匏或葫芦多制作勺器和盛放一些细杂东西的容器,在人们生活中多不可缺^⑧,加以瓜与籽的药用价值比较显著,自古即受到人们重视,也便演生出浓厚复杂的文化,专题研究者颇多。各地种植极为普遍,汉人《汜胜之书》就较为具体地计算过种瓠优厚的经济效益^⑨,直到清朝仍有方志记载有“种瓠为业”^⑩的现象。

3. 冬瓜

我国冬瓜种植与食用的历史十分悠久。无论考古还是文献资料,都表明至迟秦汉时冬瓜已经受到

①《齐民要术》卷10引《异物志》形容椰果“皮如葫芦”,《艺文类聚》卷94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所载西域人以葫芦盛水饮用,都是葫芦的早期例证。或者葫芦是“瓠瓢”两字的简写。晋人崔豹《古今注》解释瓠瓜诸多名物相对全面些:“匏,瓠也。壶卢,瓠之无柄者也。瓠有柄者曰悬瓠,可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用则漆其里。瓢,亦瓠也,瓠其总,瓢其别也。”瓢应指以匏制成的器具,而非言植物。关于瓠、匏两字的训诂关系,可参见李艳:《“瓠”“匏”“瓢”考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李朝虹:《“瓠”与“匏”辨》,《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2期。

②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第141页。但查1978、1979两年正式发表的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未提到葫芦或瓠瓜。

③杨鼎新:《杭州水田畝史前“瓜子”的鉴定》,《考古》1987年第3期。

④[明]陈道修、黄促昭纂:《(弘治)八闽通志》卷25,明弘治刻本。

⑤[明]李廷宝纂修:《(嘉靖)清苑县志》卷1,明嘉靖刻本。

⑥[清]张松孙修,胡光琦纂:《(乾隆)射洪县志》卷3,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⑦[清]李从图纂修:《(道光)镇原县志》卷11,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⑧笔者老家在江苏泰兴县,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水的瓢、盛瓜豆蔬菜种子的器具多以葫芦制作,只是后来塑料制品出现,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

⑩[清]仲振履修、仲振履纂:《(咸丰)兴宁县志》卷5,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另,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6:“虔州山以种苦瓠为业。”清光绪宁静堂刻本。

人们重视。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原发掘报告所说西瓜种子后被学者确认为冬瓜种子^①,类似的情况或者仍有。这表明至迟西汉早期,冬瓜已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献的情况也可证明。《神农本草经》(日本森立之辑本):“白瓜子,一名水芝,味甘平,生平泽。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不肌,久服轻身耐老。”《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战国末至西汉初,适与上述考古资料相印证。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食蟹中毒又方:“冬瓜汁饮二升,食冬瓜亦可。”^②可见瓜汁也为药用。

对《神农本草经》白瓜子的理解历史上有分歧,唐人《新修本草》以为“白”为“甘”之形似而误,而孙思邈《千金翼方》以为“白瓜子即冬瓜仁也”^③,宋人《证类本草》也力证“白”字非误,应指冬瓜子^④,后世多予认同。除前人所析理由外,“水芝”之名也值得注意。古人有云芝(灵芝)、水芝(藕)、土芝(甘瓜)并为“三芝”之说,这里另出水芝,应是就冬瓜肉质滋润而言。《齐民要术》于冬瓜下小字注称:“《神仙本草》谓之地芝。”地芝多称甘瓜(甜瓜),此处“地芝”或因汉人“水芝”之说误会所致。但无论“水芝”“地芝”都见出人们对冬瓜的爱好和重视。我们认为,由药用著录和“水芝”之称,冬瓜的历史应大大前推,《诗经》所说瓜蒞可能也有冬瓜的身影,只因古人独重鲜食甘瓜,于其他瓜种多笼统视之,想必后续考古会有更多发现可以证明。

冬瓜之名始见于湖南龙山县出土的里耶秦简8-1022号:“献冬瓜。”^⑤晋张揖《广雅·释草》:“冬瓜,蒞(及)也。”是既释名又注音。“蒞”字未见《说文解字》和《尔雅》。注意《广雅》以此字来解释冬瓜,是冬瓜先有“蒞”单字正名,读作“及”,“冬瓜”是后起双音俗名。根据《齐民要术》所说,冬瓜“十月霜足收之”^⑥,这在诸瓜中是最迟的,可能是其得名由来。据笔者考证,同时南方地区则名寒瓜,同义异称而已^⑦。《齐民要术》于冬瓜下引《广志》:“冬瓜,蔬距。”后世引用多将“距”写作“蒞”,前者应是传书之误,非另有一名。

汉以来,冬瓜是重要的食用、药用瓜品。历代本草、医书中,冬瓜仁都是重要的药材。北魏《齐民要术》已经记有详细的“种冬瓜法”,该书作蒞、藏生菜法中,冬瓜与越瓜又同为主要的原料,都有多种制作方法,可见有关种植、食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后世种植极为普遍,宋苏颂《本草图经》即称:“今处处有之,皆园圃所蒔。”^⑧人们论冬瓜“可蔬可羹,又可蜜煎,其子及皮,并入药”^⑨,又“可藏蓄经年”^⑩。冬瓜的产量也较为可观,浙江《(同治)丽水县志》:“冬瓜有大小二种,大者重二十余斤。”^⑪安徽《(嘉庆)绩溪县志》称“有重至四五十斤者”^⑫。因而各地传播极为广泛,种植十分积极,经济价值极其显著。

4. 越瓜

其名始见于《齐民要术》,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也正式著录。得名虽迟,但物种原始应与甜瓜相近,两者生物性状十分接近,应是同根同源,人类引种演进分化为不同品系。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越瓜以

① 叶静渊、俞为洁:《汉墓出土“西瓜子”再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② [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卷下,《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③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4,元大德梅溪书院本。

④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其主要理由有二:一、从药效上说,陶弘景等使用冬瓜仁正应合《本草经》所说效用。二、从语意逻辑上说,瓜为甘瓜通名,《本草经》下文为“瓜蒂”,如“白瓜子”为“甘瓜子”,则径称“瓜子”即可,不必专出甘字。

⑤ 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里耶秦简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⑥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

⑦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⑧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

⑨ [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卷50,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

⑩ [元]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4。

⑪ [清]彭润章纂修:《(同治)丽水县志》卷13,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⑫ [清]席存泰纂:《(嘉庆)绩溪县志》卷3,清嘉庆十五年刊本。

地名”，揣度应是相对北方常见的甘瓜而言，最初多见于南方诸越之地。唐人《本草拾遗》称：“大者色正白，越人当果食之。”^①咎殷《食医心镜》称“越瓜，鲜，久食益肠胃，和饭作鲊，并蠹菹之”^②，可见果用、蔬用均可。《齐民要术》所说多为菹藏之法，即用作腌渍。后世有菜瓜^③、生瓜^④、梢瓜^⑤等俗称，元明以来南北各地多称菜瓜，以青、白色为主。实际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越瓜，皮薄脆嫩，质地与甜瓜近，可以生食，肉质甜味逊于甜瓜，可以视作原产于越地的甜瓜品种。另一种多称作菜瓜、梢瓜，皮厚水分少，肉质较实，生食略带苦涩，只宜烹煮和腌渍^⑥。越瓜与甜瓜一样，分布十分广泛，南北种植有所不同^⑦，而地方品种更是丰富复杂。因为多只充蔬，因而种植也多因时随宜，聊备日常家用而已。

5. 哈密瓜

哈密瓜是甜瓜的一种，属硬皮种类，清康熙间定名^⑧。就我国文献记载而言，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及新疆地区。这一品种与我国内地普遍种植的薄皮甜瓜远非一类，属于中亚厚皮甜瓜种系，移种我国内地多生长不良，有明显因环境退化迹象^⑨。今人考察发现，我国新疆不少地方有对应的野生品种，我国新疆地区至少应是这一品种的次生中心^⑩。

我国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已陆续记载。至迟可以追溯到《后汉书·郡国志》所言“敦煌古瓜州，出美瓜”，稍早晋人《广志》记载敦煌与辽东、庐江并称三大著名产地^⑪，所说应包含这一品种信息。晋人王嘉《拾遗记》也说“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炖煌献异瓜种，名穹隆”^⑫。今人认为穹隆是维吾尔语甜瓜的读音，汉语显然是形容瓜大无比。所谓瓜州，地名首见于《左传》，汉时于其地设敦煌郡，包括今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广大地区。隋朝正式于此设瓜州，后改名沙州，分设西州等^⑬，顾名思义，应是以沙地适宜产瓜，且由来已久。传说这一带瓜极大，“狐食其瓜，不见首尾”^⑭。虽不免有些夸饰，但应非全然子虚乌有。这样硕大的甜瓜远非中土常见的薄皮品种，应是后世西域常见记载的厚皮种系。

敦煌一线实际只是这一甜瓜品系自然分布区的东部边缘。11世纪后期的《突厥语大词典》频繁出现甜瓜一词，所说应即这一品种，反映的应是包括我国新疆西部在内的整个西域突厥语区此类甜瓜分布

①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四部丛刊》影金泰和晦明轩本。

②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

③ 菜瓜之名或起于唐人，宋人张昞《（宝庆）会稽续志》卷4：“越瓜：《本草》云‘生越中’。陈藏器云：‘越瓜，大者色正白，越人当果，食之去烦热，解酒毒。’又自有‘黄瓜、菜瓜可充蔬茹’云。”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宋人苏颂《本草图经》：“紫菹，茎叶通紫，吴人用染菜瓜者。”见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

④ [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20：“越瓜，郡俗呼生瓜，谓可生食也。”民国《吴兴丛书》本。

⑤ 吴自牧《梦粱录》卷18“菜之品”：“紫茄、水茄、梢瓜、黄瓜、葫芦。”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菜瓜，又名梢瓜，可生食。”

⑥ 请参见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笔者少时所见，前者称菜瓜，后者有纵棱，皮白淡，称牛角瓜，古人所说“羊角瓜”或即此类。

⑦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9：“豫章郡人晚种越瓜。”韩鄂《四时纂要》卷3：“晚越瓜，此月（引者按：五月）至六月上旬种之，以供冬藏。”

⑧ 苏尔德撰《（乾隆）回疆志》卷3：“自康熙年间哈密投诚，此瓜始入中国，谓之哈密瓜。”清乾隆间抄本。

⑨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5：“京师园户以子种植者，一年形味并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则形味俱变尽。”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

⑩ 潘小芳：《新疆甜瓜的起源及栽培历史》，《新疆农业科学》1981年第5期。

⑪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引《广志》，《四部丛刊》影明抄本。

⑫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76，民国影明嘉靖谈恺刻本。此段文字，有异文，差别较大。

⑬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⑭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0。

的盛况^①。元朝疆域辽阔,鼎盛时几乎覆盖整个中亚,相关信息也就丰富起来。耶律楚材诗称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线“甘瓜如马首,大者狐可藏”^②,马可波罗在此也记载:“撒普尔干百物皆富,尤出世界最良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条,在太阳下曝晒,既干食之,其甜如蜜。”^③所说应即今哈密瓜之类。考古发现,新疆晋、唐墓葬中都出现甜瓜种籽与干燥果皮^④。元人文献中也有这一带的相关记载,1222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昌八刺城(今新疆昌吉市)受到回鹘王热情接待,席上所见“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⑤。稍后王祜《农书》称:“愚尝闻甘肃等处其甜瓜大如枕,割去其皮,其肉与瓢甘胜糖蜜。所割肤皮暴之。稍干柔韧,赍之中土,以为赠送,甘而有味。盖风土所宜,其实大而味甘,非他种可比。”^⑥所说甘肃当主要指前人所说敦煌一线,或兼今嘉峪关、酒泉一线。明朝于嘉峪关外无力统治,关西七卫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掌握,相关信息也就奇缺。王世懋《学圃杂疏》所说“今凉州塞外作干条遗远人,味极甘”^⑦,是极为罕见的信息,所说仍在嘉峪关内。让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的是,晋人《广志》早就有“瓜州大瓜大如斛,出凉州(引者按:今甘肃武威)”的说法^⑧,可见分布曾一度东达河西走廊中部。这些西域和河西走廊西部奇特大瓜的信息应是统一的品种体系,虽然称呼不够明确稳定,种植中心或有迁转,前后联系也不免间断,但相关信息和传统却源远流长。

哈密瓜之定名和广为人知始于清康熙年间。清苏尔德《(乾隆)回疆志》:“自康熙年间哈密投诚,此瓜始入中国,谓之哈密瓜。彼时皆视为珍品,价颇贵。及平定回疆以来,哈密迤西处处皆有。”^⑨所说哈密投诚,指哈密王捕获噶尔丹的儿子,改辙更张效忠清廷,时间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后不久哈密地方首领开始向清廷贡瓜,遂有哈密之名。最迟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即以哈密瓜于赐近臣张玉书^⑩。此后西域少数民族相继归顺,新疆政局愈益稳定,汉回维蒙各族深入交流,贡瓜成为年例。雍正间因事一度令停,乾隆时又命恢复。年年回人马队数千里驰运进贡,社会影响十分显著,激发内地民众对哈密瓜的强烈兴趣,也促进了新疆当地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哈密瓜的品种多样,乾隆间苏尔德《回疆志》:“平定回疆以来,哈密迤西处处皆有。其种类不同:一种皮色青白而大,或有花斑,或有棱瓣者,六七月间熟,瓢色或红或白,硬而无味,去瓢食之极甜脆,但不耐久,易于腐烂,盖内地香瓜之类也。一种色青黄,形小而圆,或有瓣有项而子小者,瓢色红黄软而多水,亦甚甜,早熟更不耐久,盖内地甜瓜之类也。一种形稍长而皮厚、青黄花斑者,瓢亦红黄,但味淡少水,可收至春间,亦可切条晒干,盖倭瓜之属也。又有回回帽、回回眼等诸名,色味俱香甜。另一种形长而皮粗味涩者,只堪煮食。”^⑪同时七十一(字椿园)《西域闻见录》也记载:“哈密瓜有十数种,绿皮绿瓢而清脆如梨甘芳似醴者为最上,圆扁如阿浑帽形白瓢者次之。绿者为上,皮淡白多绿斑点、瓢红黄色者为下,然可致远久藏,回子谓之冬瓜,可收至次年二月。余皆旋摘旋食,不能久留。”^⑫两者着眼点稍异,但合而观之,可见品种极为丰富,表明哈密瓜有着深广的地缘生物渊源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多见今人争议哈密瓜的

①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② [元]耶律楚材:《赠高善长一百韵》,《湛然居士集》卷12,《四部丛刊》影元抄本。

③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④ 潘小芳:《新疆甜瓜的起源及栽培历史》。

⑤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明正统《道藏》本。

⑥ [元]王祜:《王祜农书》卷29。

⑦ [明]王世懋:《学圃杂疏》,明《宝颜堂秘籍》本。

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四部丛刊》影明抄本。

⑨ [清]苏尔德撰:《(乾隆)回疆志》卷3,清乾隆间抄本。

⑩ [清]张玉书:《谢恩疏》,《张文贞集》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清]苏尔德撰:《(乾隆)回疆志》卷3,清乾隆间抄本。

⑫ [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3下,清《青照堂丛书》本。

源头,提请注意的是,哈密瓜之名明显后起,与哈密的联系也只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不能胶柱鼓瑟就认作我国哈密瓜的实际源头。自古以来无论内地汉语还是西域地区民族语言都统称“甜瓜”,对哈密瓜的起源、流传演变等都要纳入包括我国甘肃西部尤其是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甜瓜起源分布、传播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去把握,只有这样对其起源与发展历史才有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

(二)外来物种

1. 黄瓜

对于我国黄瓜起源与发展,舒迎澜先生《黄瓜和西瓜引种栽培史》论述较为详细,笔者就其起源及其相关食用传统演变也有一些新的考说:黄瓜的传入应与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有关,十六国时期的译经中已有“胡瓜”之名,隋炀帝时改名黄瓜。受佛经对其性味负面说法的影响,长期未获重视,南宋以来种植、食用逐渐普遍起来。由《齐民要术》可见,早期人们食用,多待瓜成熟老黄后收获,与越瓜、冬瓜等一样制作瓜蒞腌菜,所以有黄瓜之名。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转为青嫩时摘食^①,鲜食烹煮均可。黄瓜嫩时表面有刺,因而不少地方称刺瓜,应由转重嫩食引发。这一名称以浙江、福建出现最早最多^②,隐有开风气之先的色彩。黄瓜生长期较短,种植简单,我国分布十分广泛。明清时北京等地以唐花技术种植,以求早春供食^③,也是瓜蔬生产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2. 西瓜

西瓜是极为重要的瓜类作物,全球普遍重视,我国亦然。我国中古所说寒瓜是指冬瓜而非西瓜,我国唐以前没有任何西瓜种植和食用的迹象。五代后晋胡峤《陷北记》记在辽上京见到西瓜,称“契丹破回纥得此种”,通常多据《辽史·太祖本纪》所说“冬十月……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认为所谓“回纥”指高昌回纥,契丹人攻陷其夏都北疆浮图城,在这里获得西瓜。笔者考证发现,辽太祖西征不可能远达北疆浮图城,“破回纥”指其进入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漠北回纥故都,契丹人是从这里获得西瓜,引种到辽上京一线^④。

这后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涉及我国西瓜最早发源地及其域外来源和具体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又包括这样两个要点:一是新疆不宜视作我国西瓜的起源地。西瓜由西域传来,因称西瓜,这肯定没有错。但人们容易视为沿丝绸之路首先进入我国新疆,在这里落地生根后,东向续传。而从古代方志相关记载看,西瓜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是由陕西向甘肃,再到新疆,方向正好相反。除了前文所举证据,近日又发现一些新的资料。苏尔德《(乾隆)回疆志》:“西瓜,苗蔓花实悉与内地同,而味不及内地远甚。”^⑤和宁《(嘉庆)回疆通志》:“西瓜,其种由内地携去,种之者皆汉人。红黄两色,味性与内地同。”^⑥是说新疆西瓜由内地传去,最初口味也远不如内地。新疆以盛产厚皮甜瓜(哈密瓜)著称,清以来吐鲁番等个别地方有西瓜味美的记载^⑦,这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亚洲西瓜的大本营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撒马尔罕一线,元人耶律楚材称这里“甘瓜如马首,大者狐可藏”,同时称“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满筐”,大者五十斤,显然这一带西瓜与甜瓜同样硕大。而与耶律楚材同时,著名道人丘处机经过新疆昌吉西行,当地回鹘王

① 程杰:《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② [明]佚名纂:《(永乐)乐清县志》卷3,明刻本;[明]黄促昭纂:《(弘治)八闽通志》卷26,明弘治刻本。

③ 王世懋《学圃杂疏》:“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人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中官取以上供。”明《宝颜堂秘籍》本。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卷50:“今京师正二月有小黄瓜,细长如指,价昂如米,凡宴贵客用以示珍也,其实火迫而生耳。”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

④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⑤ [清]苏尔德撰:《(乾隆)回疆志》卷3。

⑥ [清]和宁纂:《(嘉庆)回疆通志》卷上2,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⑦ [清]嵇璜、曹仁虎等:《清通志》卷12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盛情款待,席间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①。语意是称赞所见瓜大,但措辞明显不同,甜瓜是大如枕,西瓜只“及秤”即只有五斤重,显然西瓜要小得多,其势不如哈密瓜。上溯唐五代、两宋更是未见新疆有一丝一毫西瓜记载。因此称我国西瓜来自西域,不能想当然地理解作由新疆最初发源再渐传内地。

二是我国西瓜最直接的来源实际在蒙古高原腹地。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却比较确凿。笔者所据除辽太祖西征所破回纥只在漠北而非高昌这一辽史大节外,还举了一个西瓜种植技术细节,同样值得重视。胡峤《陷北记》记载契丹人“以牛粪、覆棚而种”,这套技术应是由漠北传来。西瓜不耐寒,最适宜的温度在25℃上下,而蒙古高原昼夜温差大,“若春季之气候变化尤甚,当清和之日,华氏表升至八十九度时,雷一发声,忽行夏令。至于日暮,又降冰点,华氏表落至八度半。冷风俄起,寒气总至,遂纷纷飞雪,不半日间差至九十余度”^②,覆棚显然是为了早晚尤其是夜间防寒。而以牛粪种植显然也不是普通施肥,目的是为了提高地温。王祯《农书》说“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③,这是我国内地农家施肥要注意防范的,而在漠北日照强度和气温偏低的自然条件下,大量使用牛粪种植,利用微生物作用下发酵分解产生热量应可明显提高土壤温度。古人唐花技术中即有“用马粪浸水”浇灌催花一法^④,主要不在增加肥力,而是为了迅速提高地温。这在种子发芽阶段尤其必要,整个生长期大量施用牛粪,应是牛粪偏热,提供的热量大,大量施用可以明显持续提高和保持土壤温度。这与覆棚技术上下配合,综合生效,足以保障西瓜生长的必要温度,以延长其营养生长的时间。

这套技术措施无论是在亚州西瓜大本营的中亚花拉子模、撒马尔罕一带,还是我国新疆和我国最早引种西瓜的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三个处于同一纬度上的地区都非必要(也许早春播种育苗或短暂使用),而在纬度更高的蒙古高原腹地气候条件下却不可或缺。契丹人如此种植,应是西瓜新从漠北回纥传来不久,仍然沿用、保持那里的原有种法^⑤。后来技术熟悉后,发现实际没有必要,自然就会逐步放弃。宋以来我国南北各地种植西瓜,包括今黑龙江和新疆这样的极边省区,再也未见使用这套技术的任何迹象。这充分表明,这套技术应是蒙古高原腹地种植西瓜的特殊要求,而不属于同一纬度上的中亚西瓜发祥地或我国新疆地区(高昌回纥)。西瓜从中亚腹地东传我国,是远程跨越首先落脚漠北回纥汗国首府,契丹人从这里将西瓜种子及相应的种植技术,也许还包括西瓜这一名称一并引入,辽、金、南宋时再由此逐步南下华北、江南。

相关说法有必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中唐以来所谓回纥或回鹘除漠北回纥故国外,主要多指回纥亡国后西迁的甘州回纥(今甘肃西部)、高昌回纥(北疆)和葱岭西回纥(黑汗王朝)三大部分,兼有今国境内外广大地区,涉及今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不同方向上的许多国家,如果只是笼统地、简单地称我国西瓜由回纥引入,是极不明确、十分模糊的,容易引起认识上的误解或分歧。因此有关说法有必要尽量指明具体地点或大致地域范围。笔者认为五代时契丹人引入我国的西瓜其直接来源只能是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漠北回纥故都,而不是其他。

关于此后西瓜在我国境内的传播,前贤时彦已有不少论述。近年南京农业大学刘启振、王思明先生发表了两篇很好的论文,就我国古代西瓜的品种资源、分布格局、宋以来全国各地的传播过程以及对于我国饮食结构的影响等^⑥,进行详细的梳理论述,提供较为全面、具体的认识,本文就不再续貂赘复了。

①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明正统《道藏》本。

② [清]姚明辉:《(光绪)蒙古志》卷1,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③ [元]王祯:《王祯农书》卷3。

④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戊集,明刻本。

⑤ 特别提请注意,这里所说是牛粪而非马粪,蒙古草原牲畜应以马、羊为主,而专说牛粪,应是当时漠北回纥故都一线有一定的农耕人口,牛耕技术或者即由汉人北迁带来,这是西瓜落地生根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

⑥ 刘启振、王思明:《略论西瓜在中国古代的传播与发展》,《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7年第2期;刘启振、王思明:《西瓜引种传播及其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西瓜是果用瓜中的优良品种,五代时传入我国,南宋时在南北各地迅速传播,元以来已呈弥漫之势。元人王祯《农书》称“北方种者甚多,以供岁计。今南方江淮闽浙间亦效种,比北方差小,味颇减尔。”^①是说北方种植较盛,品质优而经济效益高。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则称“今则南北皆有”,王象晋《群芳谱》称“今处处有之”,至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则是“今西瓜已遍天下”^②,叙述口吻中不难感受到西瓜在我国不断扩展的历史足音。我们再引王祯《农书》所说西瓜的食用价值:“味寒解酒毒,其子曝干取仁用荐茶”,“宿醒未解,病渴(引者按:中暑)未苏,得此而食,世俗所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正谓此也”。李时珍补充说:“其瓜子曝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皮不堪啖,亦可蜜煎酱藏。”稍后王世懋《学圃杂疏》称“瓜中第一美味,而种遍天下”,谢肇淛《五杂俎》更是以反诘的口吻做了斩钉截铁的赞叹:“今时诸瓜,其色泽香味岂复有出西瓜之上者?”^③是说西瓜出现之后,我国传统果瓜都得避其一席,食物价值极为显著,从中不难感受到西瓜的引入和传播在广大民众中所受欢迎以及给我国瓜类食物带来的深广影响。

3. 丝瓜

丝瓜有不少名称,福建《(康熙)宁化县志》:“丝瓜、天罗、布瓜、蛮瓜、鱼鳢,一物五名”^④。另有称绵瓜的,笔者疑其为“丝”之繁体形似而误。我国丝瓜起步较晚,宋以前无任何丝瓜迹象,北宋后期以来渐见记载,传入我国当在北宋中期或稍前。名称中的鱼鳢,也写作鱼际、虞思等,或为外来译音。宋人有关记载多见于福建、浙江两省,此后地方志的记载也以两省为多。两广方志多称从福建引入,笔者据此推断,丝瓜当是入宋后,随着闽、浙一带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起而由海上传入^⑤。

在北宋中叶至南宋后期两个世纪中,丝瓜药用、老瓜丝络及嫩瓜食用三大价值都已经得到开发利用,元明以来各地传种越来越普遍,发展极为迅速。笔者前番拙作中有一组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分省“丝瓜”出现次数的统计,其中遗漏了河北(含京津),河北共128次,紧随福建与浙江两省之后,排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前。考虑到河北省实际面积,尤其是传统农耕区较为广阔,因而这一数据并不影响我们原有的判断。丝瓜最初起源于福建、浙江,而此后的传播发展也以东南沿海和整个东部地区领先。这里我们就爱如生《中国方志库》两辑中“丝瓜”出现的次数再行统计,时间下迄民国年间,全国各省市(港澳地区除外)除内蒙古、青海、西藏外均有丝瓜记载,其中数量排在前十的分别是河北(含京津)268、浙江233、广东(含海南)221、福建(含台湾)218、四川(含重庆)177、湖南175、山东170、江西155、江苏(含上海)147、河南142,涵盖我国东部以及全国传统农耕人口最为集中的省份,表明丝瓜种植在这些地区的分布密度较高,种植十分普遍。

4. 南瓜

南瓜是新大陆作物,起源于中南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经欧洲辗转传来我国。明中叶之前我国文献中有关信息均不可靠,我国南瓜明嘉靖以来始见记载。葡萄牙是大航海时代第一波闯入我国沿海的西方殖民势力,当时被称作佛郎机,此前曾首先攻占满刺加国(马六甲),扼控通往远东的海峡通道。满刺加当时与明朝仍有藩属关系,明朝曾收到其国王的救援请求,以为佛郎机就在满刺加(马六甲)附近,因而也视作“南番”。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一段关于南瓜来源的著名记载:“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

今人多据以认为我国南瓜应来自东南亚,由华南登陆,转福建、浙江等地,再北上至北京一线。但笔者检索明朝方志发现,明人的记载以南、北两京间的河北(含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江苏(含上海)、安徽五省最早也最多,因而断其应是明正德十五六年即公元1520-1521年间由葡萄牙商团随行的葡萄牙

① [元]王祯:《王祯农书》卷29。

②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3,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刻本。

③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0。

④ [清]祝文郁修,李世熊纂:《(康熙)宁化县志》卷2,清同治八年重刊本。

⑤ 程杰:《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王室遣华使者带来。在当时的欧洲,南瓜作为观果植物广受欢迎,葡萄牙国王对遥远的中国极为重视,应是以此礼赠中国皇帝。在新大陆作物中,南瓜之所以在中国最早传播,可能与这种王室间的顶层交往有关^①。

进而笔者还发现,两京之间分布也不对等,最初的南瓜信息都见于北京附近,是葡萄牙使者只带到北京,由皇家御苑首先种植,就近流入京冀民间,以明长城为北界南向发散传播。在东部地区主要沿运河南下,在西部则由河南南下两湖、贵州,经河南、山西传向西北地区^②。到了明朝晚期,除今东北黑龙江、吉林,西北新疆、青海,西南西藏等少数边疆地区外,其他大陆各省区地方志均有南瓜的记载,可见传播之迅速、分布之广泛。在华北、华东、中原地区分布尤为密集,成了较为重要的农作物。

对于清至民国年间我国南瓜的传播与发展,南京农业大学李昕升博士的系列论文多有涉及,融会在《中国南瓜史》一书中,论述比较详细。南瓜耐旱,适应性强,成熟的瓜实极耐储存,正可瓜粮兼用。李博士的专著对南瓜的经济价值、种植加工技术等都有专题论述,较为系统地展示了南瓜丰富的资源价值及其广泛传种给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③,值得参考。

笔者这里的历史讨论远不够充分,这不仅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很难在这短小的篇幅中一一说清,关键还在有两个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是瓜业是农史中的边缘课题,古人除农书、本草中有一些直接的资料,地方志有一些物产名录外,各类史书很少有正面、具体的记载,相关经济活动的规模、活动、效益等方面极少有明确的史料,这方面的论述难以具体、深入。二是生物及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既非本人专业所长,同时也考虑已有农史、园艺史相关论述比较充分,瓜作种植技术相对简单,东西南北各有不同,因地制宜的因素更多,因而也就有意识地省却了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的论述更多侧重在各类瓜作的起源与整体发展进程,远不全面和充分,是十足的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读到农史行家这方面理想的论述。

（上接第12页）

此外,汪沟先民可能也采摘一些苋属、藜属等野菜和李属、核桃属等果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植物遗存的空间分布分析显示靠近外层壕沟即遗址边缘区域植物遗存相对较少,人类活动相对较少,靠近内层环壕的管网工程发掘区,植物遗存出土密度较高,可能是遗址的居住区。遗址的功能分区也是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并走向复杂化的表现之一。

[样品采集得到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魏青利、丁兰坡等老师的大力支持,浮选工作得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董树林老师的帮助,样品鉴定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金刚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特致诚挚谢意。]

① 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阅江学刊》2018年第2期。

② 程杰:《我国南瓜种植发源、兴起于京冀》,《阅江学刊》2019年第2期。

③ 李昕升:《中国南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57-368页。